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肇始与应变

闫 静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济南 250100;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济南 250100)

摘 要 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档案高等教育事业的诞生。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中国档案高等教育伴随着对苏联经验的引进、对初创时期的规划设想而逐步发展。随后的十余年,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档案高等教育先驱们固有的革命传统以及档案学自身的性质与功能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应变,在秉承档案学实践性的同时,强化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理性,促进了学科自觉的发生,完成了从职业教育向专业教育的转变,并逐渐从“苏联蓝本”中过渡到“本土化”的教学体系。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肇始与应变所体现出的档案学科的“独立性”“专业性”与“本土化”定位,依然深刻影响着当代档案高等教育及档案学的发展。

关键词 高等教育 档案学 职业教育 专业教育 苏联专家 中国人民大学

DOI: 10.16065/j.cnki.issn1002-1620.2021.02.020

The Commence and Response of Archival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During 1950s and 1960s

YAN J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dvanced Institute of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China, Ji'nan 250100)

Abstract: The foundation of special training archival class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 1952 marked the birth of archival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early 1950s, archival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ed gradually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Soviet experience and the planning assumptions in the formation period. In the following ten years, archival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dapted in response to the distinct historical background, archivists'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archival science itself. While adhering to the practicality of archival science, it strengthened its academic rationality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promoted the occurrence of discipline consciousness,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gradually transferred from "Soviet template" to "localized" teaching system. The orientation of "independence", "speci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archival discipline during 1950s and 1960s still profoundly influences and enlighten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rchival higher education and archival science.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archival science;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oviet expe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0 引言

“实质性(学术)革命行为可以包括学术期刊的创刊、开创性学术成果的面世、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

等等。”^[1]由此可见,在学术格局中,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对于学术发展作用甚重。而在中国档案学发展史中,高等教育机构从无到有的成立更是具有革命性意义,为中国档案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和人才支撑。时至今日,档案高等教育机构既承担着教学和培养学生之责,更肩负着档案学术研究之任,教育机构的学者构成了学术研究的主力军,这种格局自1952年我国首个档案高等教育机构成立以来一直持续至今。虽然“档案学研究”和“档案教育”在内涵和外延上有所差别,正如1996年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SAA)指南中所界定:“档案教育超越了档案学的研究领域和通常上所说的档案学科。”^[2]但这仍不能掩盖二者之间尤其是档案学研究与档案高等教育的密切关联。

中国档案高等教育起步较晚,1952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成立,标志着中国档案高等教育事业的诞生。随后的二十余年中,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档案学术研究的重镇,并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孕育了“从1到38”^[3]的档案高等教育规模体系,实现了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历史性跨越。但这“1”的开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其中有哪些曲折或流变?现有研究成果却鲜少详细论及。随着笔者研究中国现代档案学史过程中对相关资料的整理,作为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发源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及其前身的诸多档案及教学资料得以挖掘,档案高等教育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肇始历程得以呈现,沿着这些资料的时代轨迹,其中又呈现出些许档案高等教育的转向与流变痕迹。本文试图根据所查资料,梳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肇始与应变,以增强对中国特色档案学及档案人才培养的更多了解。

1 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肇始

1.1 对苏联档案高等教育经验的引进

将中国档案高等教育放置于中国大学发展史中,更有助于缕析其发展的契合点与学术脉络。张德祥将中国大学发展史视为一部国家政策主导下的大学治理变迁史,并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细化为确立高教管理体制中央集权阶段、由集权向放权的尝试阶段、由放权到收权的调整阶段。^[4]姚若冰则根据国家经济和政治诉求的变化将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分为学术性教育模式和革命性教育模式两种,并细化为移植苏联学制阶段、大跃进阶段、调整阶段与两条路线斗争阶段。^[5]无论分期如何,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结束了民国时期学术相对独立的体制,建立了以党治学的政学合一的体制”^[6]。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背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移植苏联学制阶段,并以苏联模

式为蓝本、以苏联经验为依据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改革的首要举措即是翻译苏联大学教育的相关著作,并对苏联教育模式与教育方法予以研究。1949年9月,东北英文研究会就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出版的《苏联大学教育》英文版翻译了此书。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学习苏联建立的两所“样板大学”之一组织编印了《苏联高等学校》。随后,苏联高等教育论著被陆续译成中文,如《苏联高等教育》《苏联高等学校章程》等。1952年至1956年四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正式套用苏联模式进行改革,在大学中按专业细化学科,并按学科统筹招生工作。教学计划制订、教学教材编写、教学方法推广、教学制度执行等苏联经验,都被直接或间接地移植到彼时的中国大学教育中。受时代影响,中国档案高等教育同样肇始于对苏联档案高等教育经验的引进。

苏联档案高等教育始于1930年9月3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在苏联中央档案管理局下设档案学院的决定》,这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档案高等教育的序幕。1938年,为培养档案专业人才之需,苏联又创办了两所档案学校,学员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或地方档案机构为学术工作人员,或在省档案馆为馆长,或留校继续深造,或研究历史”^[7]。鉴于苏联档案高等教育二十余载的发展历程,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和相对完备的课程体系,其开办模式、教材建设、师资队伍等均对档案高等教育创办初期的我国提供了借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苏联档案高等教育经验的学习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大量翻译苏联档案学著作、教材、文集、报告、规章制度条例等,二是聘请苏联档案专家来华任教讲学或作学术报告。首先,为了将苏联档案著作译成中文,档案界特从中央编译局调配组建了一批俄语翻译人员,负责系统翻译苏联档案论著及苏联专家的讲稿和报告,为档案高等教育的开办提供素材和参考。这些译著主要包括各种系统性的档案学术专著和在苏联刊出的历史档案类论文,其中有介绍苏联档案馆及其管理任务的,有关于档案全宗区分、档案整理鉴定、档案编目与参考工具编制以及提供档案利用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总结的,有关于底图、影片、照片和录音档案管理原则和方法的,还有关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档案工作组织沿革介绍的。除翻译各类苏联档案论著外,我国还利用各种机会派代表赴苏联考察档案工作实际和档案学发展状况。如1957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的裴桐和田风起、吴善

昌专程访问苏联,参观了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档案馆、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国家中央档案馆等机构。其次,苏联档案专家米留申、谢列兹聂夫、沃尔钦科夫和舍皮波娃先后来华传播苏联档案学术和档案实践,为中国档案高等教育创办带来了直接经验。1949年11月,时任苏联中央档案管理局副局长的米留申来华指导档案工作,并在回国之际提出多项关于发展档案事业、创建档案高等教育、发展现代档案学的宝贵建议。随后,为开办新中国第一所正规档案高等教育的需要,在周恩来总理的协调下,苏联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的历史档案专家谢列兹聂夫来华任教,为我国档案高等教育培养教员和学生,其档案学著作、教材提纲、课程讲稿、专家指导报告均被悉数译成中文,在我国档案教育和档案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待谢列兹聂夫回国后不久,苏联档案专家沃尔钦科夫和舍皮波娃先后来华,介绍苏联档案工作及学术研究进展。

1.2 档案学科概念的由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档案教育整体情况

在引进苏联档案高等教育经验的过程中,我国逐渐明确了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概念。其实在民国时期,档案学科概念即已萌芽,只不过囿于时代更替,档案学并未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予以构建。早在1940年,武汉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呈文当时的教育部指出,“档案管理这项研究‘日渐由试验而发展为独立学科’,‘档案管理之内容并不简单,而许多有关科目,如行政组织、公务管理及文书之制作及处理等,必须循序研究,始能组成一完备知识。故档案管理不能再以图书馆学之附庸视之而实有独立成科之必要’。”^[8]同年10月17日获教育部高

34635号指令批准,“二十九年九月廿六日呈一件,为拟设档案管理科……呈件均悉,所请应予照准。件存。此令。”^[9]虽有呈文为证,但档案高等教育的创办并未实现。事实上,那一时期,“36种著作里唯一以档案和档案工作为研究内容的4种著作中”^[10],所论及的仍多关乎“档案管理”和“档案处理”;教育部呈文中也以“档案管理”为阐述对象,“学术”尚处萌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档案事业及档案管理实践迫切需要科学而系统的理论指导,档案学科概念得以重提。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档案学科的独立化建制亟须教育机制的保驾护航,加之国家力量的推动,档案教育机构纷纷涌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档案高等教育伴随着各类早于它的档案训练班和晚于它的继续教育开展(见表1),并反哺了档案职业培训。在档案高等教育开办前,1950年11月至1951年6月,鉴于档案实际工作对专门人才的需求,中南军政委员会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委托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开办档案管理人员训练班;1951年,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修科开办档案资料专修班培养档案人员,二者仍沿用新中国成立前的教材开展教学工作,但均不久后即停办。1952年6月,辽西省首次采用苏联经验开展档案工作短期研究班;同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成立,标志着新中国档案高等教育事业的诞生。随后,中央与各地区分别开办了短期档案职业训练班,开展继续教育。以上档案教育机构的创立颇具时代嬗递色彩,文华图专与北京大学档案资料专修班的开办,只是民国时期档案教育机构短暂性的延续,注定了它们很快停办的命运;而各省各地开展的干部训练班、成人培训班等主要基于档案工作的开展而

表1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档案教育机构概况

开办时间	教育机构	开办机构
1950年	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档案管理训练班	中南军政委员会和湖北省人民政府
1951年	北京大学档案资料专修班	北京大学
1952年	辽西省短期档案训练班	辽西省委
1952年	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	中共中央办公厅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中国人民大学商定创办
1955年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	高等教育部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基础上成立
1956年	中央机关档案干部训练班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家档案局
1958年	复旦大学、上海第一师范学院档案专业课程班	国家档案局、教育部
1958年	天津市河北区干部(职工)大学档案系	不详
1959年	天津新华业务(职工)大学档案专业	天津市和平区档案馆、天津新华大学
1960年	北京档案学院	国务院、中共中央办公厅
1964年	呼和浩特牧区、边境地区档案干部训练班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管理局

进行的短平快式职业训练,不可能长久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新中国档案高等教育基地的创办绝非偶然,新中国成立后对档案高等教育的内在需求、档案学自身的性质与功能、档案学先驱们的推动促使它很快成长起来。

1.3 档案高等教育计划的初步设想

由前所述,1950年米留申作为受新中国政府邀请的100位苏联专家之一,在考察了我国档案工作实际情况后,建议我国成立档案高等教育机构以改善档案管理实践落后的局面。这一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受命开展具体的实施工作,并提出“档案教育先行”实施方案,即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以此为起点,聘请苏联专家,以培训中国教员和在职干部为目标,逐步向正规高等教育转变。在初步设想中,教员与学员、课程开设构成了两大难题。

专修科档案班成立之初,由于开办条件不成熟、中国教员短缺,此时主要以档案基本知识传授和职业技能培训为主对来自全国各地的档案干部进行职业教育。1952年9月,为充实我国档案教员队伍,分别从北京、山东、上海等地调来档案干部组成首批教员,并被暂时安排在中国历史教研室。如吴宝康就是从中共中央华东局调至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随即调至中国人民大学任档案专修班主任;田奇从中央组织部调至任副主任;田凤起、李凤楼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调至从事档案教学工作;韦庆远则从中国历史教研室调配开展档案学研究,他们一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最早的档案教员。^[11]由于这些教员均未受过档案学系统训练,因此,专修科档案班第一年的课程主要由谢列兹聂夫讲授,中国教员负责课程讨论和实验课程的教学工作。“当时的授课程序是:苏联专家先教译员,专家边讲解,译员边把俄文讲稿译成中文;然后讲给教员,并进行辅导和答疑;最后上全体学员大课,教员跟着大课再听一遍。”^[12]

谢列兹聂夫在华的档案教学本身也是困难重重,在既不懂中文又不甚了解中国档案工作实际与历史的情况下,只能以讲授苏联档案学理论和实践为主,将莫斯科档案学院的课程移植过来,根本谈不上“中国化”。就这样,在翻译组成员的配合下,谢列兹聂夫来华第一年共开设有六门课程: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苏联档案史、苏联文书处理工作、苏联文献公布学、苏联档案保护技术学、苏联科技档案。从名称上看,这六门课程均是“苏联”的完全照搬。经过这六门课程的学习,加之一年的专业训

练,中国教员开始尝试撰写课程讲稿,但因没有条件撰写出完整的教材书目,只能根据专家建议先对教学大纲和教材绪论予以补充修订,力争把“苏联”二字去掉,发展出一套中国化的讲义。

苏联专家和中国教员初步到位,学员从何而来就成了另一个重要问题。1952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组织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工作训练班招生的通知》。《通知》中所称的“档案工作训练班”,即为专修科档案班(当年11月开学后改名),可见其最初创办之目的。生源多为党政机关、群众团体机关等实践领域的档案干部。档案班所修课程中,由于档案课程完全为苏联体系,故开设了马列主义基础、中国共产党党章、国家法等课程,旨在加强学员的思想修养,开设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旨在加强学员的历史修养。而为了配合档案实践,档案班还设立实验室作为辅助教学场所。虽称“实验室”,但由于条件简陋、材料短缺,实验课首要任务是将这些混乱的材料立卷、分类、编目、登记。为了充实实验室材料,中国人民大学主动接收了一批档案,如1954年年底,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6月10日政秘齐字第59号通知》,华北人民政府、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门的档案共4410卷(册)和772公斤陆续移交至中国人民大学档案教研室保管。^[13]实验课程的开设也符合档案高等教育初创时对职业技能培训的初步设想。经过一年预热,1953年第一届专修科档案班正式结业。同年,经过对课程开设情况的总结,档案班一年学习期限改为两年,并将学员数量控制在100至150人左右,增加了实验时间,两年课程的设置有所丰富(见表2)。

这其中,除中国档案史外,本土化档案课程开设极少,仅有的几门也是苏联体系。相反,由于档案与历史天然相关,档案教育对史学类的教学非常重视,档案历史教研室也成为最早成立的两个教研室之一。而中国档案史由于毫无内容与体例上的借鉴,其研究任务按历史时期细化到每位研究员身上,17世纪前的档案史由一人负责、17世纪和18世纪由一人负责、19世纪到1949年由两人负责、1949年之后由两人负责,党的档案史和党的组织发展史亦分配专人负责研究,并设有主任一名。中国国家机关史与国家法课程主要研究国家各机关各部门的产生时代、发展情况、承担任务,各时期文书处理与档案工作情况,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同法律系共同合作研究。这些课程构成了专修科档案班时期档案高等教育的初步情况。

表2 两年制专修科档案班课程设置情况

学年	开设课程	学时(小时)
第一学年	1.马列主义	130
	2.中国历史	110
	3.中国文书处理	20
	4.实验课:中国文书处理(古代与现代)	60
	5.苏联十月革命前后的文书处理	30
	6.中国国家机关历史与国家法	140
第二学年	1.中国革命史	100
	2.党史	不详
	3.中国档案史	36
	4.苏联档案史	50
	5.苏联档案理论与实践	74
	6.实验课	170
	7.生产实习	一个月或一个半月
	8.考试	不详

2 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应变

2.1 档案学科属性的界定和学科自觉的发生

专修科档案班阶段,对档案学的学科属性尚未界定,档案学的学科独立性也未明确提出,所开设的课程也仅为实践服务,目的在于培养可以胜任档案管理的专门人才,加之“苏联也只是把档案学视为历史学的辅助科目”^[14],因此在课程设置时,史学类科目占比较大,甚至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历史档案系时,也在教学方案设定中,加入了较多的文史类课程,如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文学史、史学等。^[15]史学课程之所以占很大比重,主要考虑到历史学和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密切相关,档案理论与实践要利用历史科学名词加以开展。与此同时,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档案学并未在历史学的光环下失去自身色彩,我国逐渐认识到档案学应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既不分化于图书馆学等资料性学科,也不应设置在历史教研室等史料性机构,而是有着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我国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档案学被列入16个独立学科之一,档案学科独立地位的属性得到正式认可。同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对档案学及其他辅助科目,应加强研究工作”的任务。加之苏联专家回国后,我国开始自主研究档案学的基础问题,除对文书学和档案管理基础业务流程的研究外,逐渐深化对

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丰富档案学的学科体系和分支科目。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指导思想,提高了档案理论研究的科学性。档案学人纷纷对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如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档案学的学科体系及各分支科目的关系、档案的概念解读与范围界定、档案工作中的矛盾问题与规律探析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正是档案学科意识觉醒的重要表征。但档案学科意识的明确仍经历了诸多波折。“由于档案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并不是所有人对它都有正确的认识。几年来,关于档案学是不是科学问题,是怎样一门科学问题,有不同的意见和争论。”^[16]1957年夏,有人对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是否有必要办系时,曾不适当地认为:

“如果说档案学是科学,那完全是某些人的主观认识,而没有客观依据。”^[17]此类质疑与否定,激励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档案学人在档案学研究领域刻苦耕耘,《关于档案学问题》(1957)、《努力发展档案学》(1957)、《论全宗问题》(1959)、《试谈档案的定义、范围和作用》(1960)、《档案学是一门科学》(1961)、《关于档案现象中的矛盾运动问题》(1962)、《试述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性质及其规律》(1963)、《档案的形成规律与档案的历史联系》(1963)等论著相继问世。这些论著通过对档案学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学科特点、学科本质的剖析,正本清源,详细阐述了档案学的“学”在何处、“学”当何解,明确了档案学的科学属性与学科地位。

2.2 从职业教育转向专业教育

随着苏联专家的回国以及我国档案教学队伍的初步形成,档案高等教育也从以职业培训为主的职业教育逐渐过渡到以科学研究及理论探索为目的的专业教育,开始强调档案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和对档案学术内核的掌握。这种教育思维与教学重心的转变,也产生了不同成效——专修科档案班以职业教育模式培养档案实际工作专业人才,其学员大多来自基层部门,培训结束后即返回原岗位;而1955年本科生教育的开展,则开始尝试以专业教育模式培养人才,各科目教学内容的理论性更强,由此造就出了一批档案学家。

1955年历史档案系的成立对于档案高等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开启了从职业教育向专业教育转变的历程。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招收了档案教育史上首届档案本科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招生消息》对报考学员的具体资质予以规定:“具有相当于

高中毕业文化程度,三年以上的工作历史,其中一年以上时间从事与秘书或档案相关的工作,或是自愿学习档案专业的其他干部。考试内容为本国语文、政治常识、历史等科目。”^[18]在本科生四年的学习期限内,所学科目主要分两类:一类是一般课程,如马克思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外历史等15门科目;一类是专业课程,如文书处理、档案工作理论、档案史等8门科目。据1962届(第四届)本科毕业生吕智新回忆:“我读的历史档案系本科是四年制的,其课程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通史、世界简史、中国地理、政治理论、逻辑学、档案管理学、文书学、技术档案学、文献编纂学、档案技术保管学、中国档案史、外国档案史、文献修复、文件缩微、影片档案管理等近20门课程。”^[19]由招生要求及吕智新的回忆可看出,不同于前三年的专修科教育,本科招生需通过正规考试,入学条件限制严格,所学课程中专业课程比例扩大,档案理论知识与档案技术操作理论成为重要学习课程。此外,与专修科教育最为不同的是,本科生在进行专业学习的同时逐渐开始档案学术研究,尤其是在毕业前进行学术论文的写作;同时帮助档案教员搜集资料、编写教材,学生与教员的“教学相长”加速了档案学术研究的进程。

为了配合专业教育的开展,历史档案系甫一成立即组建了四个专门教研室,并配备一定数量的研究人员。其中,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教研室配备8~11人,档案历史与组织教研室配备3~4人,国家机关史与文书学教研室配备4~5人或6人,文献公布学教研室配备4人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20]从研究力量对比来看,专业教育阶段逐渐从以历史类课程为主、以苏联体系为主转变为以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为主,且逐渐“去苏联化”。1958年之后,历史课程比例进一步下降,相比于政治理论课占25%、专业课占35%,历史课程下降到22%。^[21]档案高等教育成为名副其实的“专业性教育”。

2.3 “本土化”档案课程的确立与开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档案高等教育应变的另一表现形式,为“本土化”档案课程的确立与开设。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甚至直至今日,学界依然在探索学术的“本土化”与教育的“中国特色”。“本土化”档案课程的设置从中国人民大学开办专修科档案班时即着手筹备。1952年档案高等教育建立之初,为实现档案教学的“本土化”,为档案教育做好师资储备工作,在尚未开设本科教育的情况下即决定培养一批研究生作为档案教员,并制定了具体的培养方案。

“研究生应给以特定的问题在理论与实践让他们研究解决。……具体计划包括:具体业务课程是什么?考试制度?理论与实践课应研究中国档案问题,每个研究生都有不同的问题。研究生应参加教员的教学研究会议。……研究生将来教哪一门就要特别钻研哪一门,将来要研究生自己写这一门的讲义。研究生在研究一定时期后可作专题报告。”^[22]

根据这份培养方案,为了将研究生培养成既能开展教学又能独立进行研究的学术骨干,最初设置了三年学习时限。所招考的研究生必须是大学毕业生或从事过档案工作,毕业后可掌握系统而深入的档案学知识,直接从事档案学研究和教学工作。^[23]在此规划下,1954年第一期研究生班共9人毕业,他们也马上成为档案理论研究的重要力量。根据研究生班三年制的培养目标,第二年根据学生情况分成国家机关史文书处理、中苏档案史、档案理论与实践三个专业,每位研究生所学专业科目要比一般学员更加深入,并配合进行翻译工作;第三年主要结合档案学各方面的研究全面系统学习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并撰写科学论文,学校代表和教研室代表配合审查论文进展。这三年的学习安排旨在将研究生培养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档案学专家,毕业后可从事档案教学和学术研究。从1953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主张并采用了苏联式的研究生培养方法,“招收导师制副博士研究生”^[24],研究生既要学习通识课和专业课程,又要独立钻研撰写毕业论文、还要从事教学与实习工作,而且采取双导师制培养模式,一位是苏联专家,一位是本校教师。档案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也在此政策下不断完善。

事实证明,研究生培养对中国档案高等教育“本土化”课程的确立和开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少而精”的招生原则、“以自学读书和调查研究为主,辅以教员和业务部门有关同志作专题报告或专题讲授”^[25]的教学方式,以毕业论文撰写为重要环节,培养出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本土化”档案专业教师队伍。吴宝康在总结20世纪五六十年代档案教育建设时曾强调,档案师资中“既有具备一定文书、档案工作实际经验的同志,又有对历史或技术有一定研究的同志;既有机关专业干部,也有大学和研究班的毕业生;既有老干部,也有青年教师;既有老档案工作者,也有新档案工作者。这样一支教师队伍在旧中国是没有的,它是在解放后逐步成长起来的”^[26]。在此种师资结构下,我国逐渐摆脱了档案课程设置的“苏联体系”,开始了“本土化”课程体系的建设。到1955年,档案学科体系发展到七门“本土化”课程的

设置——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文书处理学、中国国家机关史、中国档案史、档案保管技术学、档案文献公布学、苏联档案史等。到1959年,档案学课程体系扩展到九门,除增加了档案学概论和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管理外,其他课程名称均有所变化,学科外延与学科内涵均有所延展,体现了中国特色。1961年,中央批准试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校六十条》,其中研究了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如教与学、理论与实践、教学与科研、党政与学术等的关系,这对我国20世纪60年代的档案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吴宝康根据这一精神,在《档案学是一门科学》中系统构建了中国化的档案学科体系,并详细阐明了各门科目的具体内容,算是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档案学本土化努力成果的集中呈现。在这一体系架构中,档案学基础类学科、衍生类学科、相关类学科一应俱全。自此,“本土化”的档案学课程体系得以确立,并一直沿用至改革开放后的档案学科建设。

3 对当代档案高等教育及档案学发展的影响

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档案高等教育,伴随着对苏联经验的引进、对初创时期的规划设计而逐步发展。五六十年代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档案高等教育先驱们固有的革命传统以及档案学自身的性质与功能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又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应变——在秉承档案学实践性的同时,强化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理性,促进了学科自觉的发生,完成了从职业教育向专业教育的转变,逐渐从“苏联蓝本”中过渡到“本土化”的教学体系。这一时期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一些特质,依然深刻影响着当下档案高等教育及档案学的发展。

首先,档案学科的“独立性”定位影响着当代档案高等教育与学术发展。“独立学科”实则为学术建制化与学科制度化的产物,是自在知识体系和外在权力体系之下对某一学术范畴的认知认同和职业认同。如前所述,尽管民国时期已有将“档案管理独立成科之必要”的想法,但档案学科“独立性”的真正实现则伴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档案高等教育的肇始与应变。正是档案学科的“独立性”定位使得当代档案高等教育和档案学不断在知识体系、逻辑架构、精神风范与学科规范等内在观念建制,以及学术组织和交流机制等外在社会建制上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换言之,档

案高等教育的创办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但其所依附的档案学科建构,即对档案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基本方法的探索,或解决好档案学科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却非一时之功。对于档案学科而言,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确定是一个不断厘清的过程,其精神风范和学科规范的成型是一个不断塑造的过程,其学术组织和交流机制的完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档案高等教育肇始与应变中所确立的知识体系与学科逻辑架构为档案学科的独立性奠定了根基,而档案学科的独立性定位也为当代档案高等教育的继续发展与档案学术的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

其次,档案学科的“专业性”定位影响着当代档案高等教育与学术发展。尽管档案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但这并不代表档案高等教育不需要研究理论、传授理论。相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档案学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能否立足,根本在于其有无理论、理论水平高不高。当然,这并不是说档案高等教育不需要结合实践、档案学研究不需要考虑实践需求,只不过高等教育的本质与目标在于传承文化、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培育理性精神。20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档案高等教育从职业教育到专业教育的转向,则是奠定档案学科“专业性”地位的重要时期,为当代档案高等教育与学术发展积累了较为丰厚的学术遗产。这种专业性定位既体现在学者群体的形成上,又体现在学科模块的设置上。由前所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以教授和研究档案学为职业的中国档案学者群体逐渐形成,他们以档案高等教育为依托,发表相关论著,出版专业期刊,从事专业教学,开展学术研究,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档案理论,使得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地位得以基本确立。这些均是以职业培训为目的的职业教育所无法实现的。在学科模块的设置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档案学基本理论与档案事业知识模块”“档案管理基础知识模块”“历史档案管理知识模块”等课程设置,仍在当今的《高等学校档案学本科专业指导性规范》中得以延续。由此,专业的档案人才需要专业性强的档案高等教育及档案学理论研究成果,“专业性”的学科定位更有助于发挥档案学在传承人类历史文化、保存社会记忆中的作用。

再次,档案学科的“本土化”定位影响着当代档案高等教育与学术发展。正如柯文(Paul A.Cohen)于《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所提出的,要探讨中国发展的内在动力,必须摆脱西方中心主义。^[27]20世纪

五六十年代,为了发展中国的档案教育与档案学,必须摆脱苏联中心主义。在这一信念的指引下,无论是1955年七门本土化档案科目的设置,还是1959年发展到的九门,抑或是1961年中国化档案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成型,均可视为中国档案高等教育及档案学摆脱苏联体系的重要成果,而这一成果也为当代档案高等教育与学科发展提供了可供继承的学术遗产。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档案学研究已从效仿苏联到学习欧美再到回归本土转变,相应地,我国档案高等教育也从引进苏联经验到独立自主发展转变。只不过随着档案高等教育的历史性飞跃与档案学的逐渐成熟,这种“本土化”定位不仅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倡导的档案学学科体系的本土化,还扩展到了档案学概念体系、思想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与学术体系等诸多方面。目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为新时代的学术呼唤,以中国档案高等教育为重要依托的中国特色档案学更应继承“本土化”的优良基因,真正实现中国档案教育和档案理论的“中国化”。

总之,历经半个多世纪,尽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但档案学仍属于冷门“绝学”的范畴^[28],与其他学科相比,档案高等教育规模依然“小”而“微”。基于这样的现实,20世纪五六十年代档案学科“独立性”“专业性”与“本土化”的定位会在当代和未来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成为打造中国特色档案高等教育及中国档案学派不可忽视的历史遗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后现代语境中的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编号:19CTQ034)阶段性成果。

参 考 文 献

- [1] 施爱东. 学术行业生态志: 以中国现代民俗学为例[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2): 5-25.
- [2] Borje Justrell. What Is This Thing We Call Archival Science? A Report on an International Survey [M]. Sweden: Tryckeri AB Smaland, 1999: 46.
- [3] 冯惠玲. 改革开放40年: 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历史性跨越[J]. 档案学通讯, 2018(6): 4-9.
- [4] 张德祥. 1949年以来中国大学治理的历史变迁——基于政策变革的思考[J]. 中国高教研究, 2016(2): 29-36.
- [5] 姚若冰. 中国教育(1949—1982) [M]. 香港: 华风书局, 1984: 6-7.
- [6] 吴海江. 中国大学学术生态的历史反思与现代重构[J]. 复旦教育论坛, 2014(6): 10-16.
- [7] 傅振伦. 档案与资料(讲义) [M].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印, 1951: 5.
- [8][10] 周洪宇. 不朽的文华——从文华公书林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409.
- [9] 梁建洲. 中国档案管理专业教育的开拓者——记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上) [J]. 档案与史学, 1998(3): 73-80.
- [11] 程桂芬. 一个老档案工作者的回忆 [M].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9: 7.
- [12][13][15]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简史(1952—2012) [M]. 中国人民大学内部资料, 2016: 10, 54-55, 12.
- [14] 周雪恒. 中国档案事业史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545-546.
- [16][17]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档案学教研室. 档案学概论讲义(初稿) [M]. 中国人民大学内部资料, 1960: 47.
- [18]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招生消息 [J]. 档案工作, 1955(2): 22.
- [19] 吕智新. 记忆之光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7: 110.
- [20] 谢列兹聂夫论文报告辅导记录集(1952—1955)·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专家辅导(第二部分) [M]. 中国人民大学校内资料, 1957.
- [21] 剩下18%为文化课。(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历史档案系五年规划纲要草案(1958—1962)》, 1958年7月)
- [22] 谢列兹聂夫论文报告辅导记录集(1952—1955)·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专家辅导(第一部分) [M]. 中国人民大学校内资料, 1957: 2-3.
- [23]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招生简讯 [J]. 档案工作, 1953(2): 19.
- [24]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教育三十年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3.
- [25][26] 吴宝康. 档案干部的培养训练和档案理论工作 [A].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 档案工作文件和论文选编(第二集) [C]. 中国人民大学内部文件, 1986: 97-98, 94.
- [27] [美] 柯文. 在中国发现历史: 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M]. 林同奇,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14.
- [28] 2019年6月25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的《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申报公告》中, 将档案学所属的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列为冷门“绝学”涉及的一级学科门类。